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 双重变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文化学术镜像

罗云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学术镜像/罗云锋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09770-4

I. ①文... II. ①罗...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文化—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I206.7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0671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鲍 静

封面设计 范昊如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学术镜像

罗云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770-4/C·373

定价 30.00元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

本书稿是近几年来围绕相关的主题断断续续地写成的，记录了个体的阅读史和思考史，也算是对初期学术求索历史的一个小小总结，对自己而言，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如果寻绎其间的历时线索，一方面当然是自己的思想关注和阅读范围的不断拓展，另一方面竟然也和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学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实际走向暗暗相合，那就是从文史哲的阅读和思考扩展到社会科学(或广义文化研究)的阅读和思考。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文化的面相，亦有相应之记录与反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面相，恰是众声喧哗、纷繁多歧。而于其中又有根本线索存焉，简单说来，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特征是“思想解放与文学启蒙”，90 年代的学术风尚特征可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来概括，新世纪以来，学术文化发展的线索却是笔者所归纳的“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亦可置换为“人文学科淡隐，社会科学凸显”，这里采用的都是狭义概念，狭义的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学、史学、哲学等，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则主要指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等)，这也和笔者所提及的另一个文化政治思想命题即“社会科学治国”的思路合二为一了。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却是由“文学、思想、学问的交相辉映”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这里的“文化研究”取其广义含义，重点传达出一种思想批判和社会关切意识，既可通过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来体现，随着知识权势的演化转移，也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科学所承担，此亦即上文

所谓的“社会科学凸显”，或“从文学研究到广义文化研究”的“知识权势转移”。

本书稿无意于对整个过程进行全景式的“深度描述”，而是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以独特的方式，对期间的一些学术文化动向作出了自己的反映和思考。其中第一、二章主要谈文学，譬如对影响新世纪文学的若干因素、多元化和价值重建之关系、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穿越）以及小说和诗歌的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等。第三、四章则对文学研究与史学、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之间新型互动关系，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察和意见，体现了逐渐成为学界研究趋势的跨学科的思路，譬如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文学史分期问题，从学术分科的角度谈文史关系，以及对文史研究中的某些新动向之一——文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或文化研究等论题提出了新颖的看法。如果说文化研究是“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的某种过渡性表现的话，第五章讨论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传播学论题便是“社会科学凸显”的直接表现。由“文学的影响”而走向“传播的影响”，由“思想解放与文学启蒙”而走向“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这不仅是传播媒介的变迁，更是新世纪以来整个知识权势转移的某种缩影。最后，附录列入近年写就的一篇探讨法律与人情关系的文章，既延续了此前一如既往的文化关注，也提示了今后的研究兴趣方向。

目 录

前言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 / 1

第一章 文学的困境、出路与前景 / 1

第一节 “介入”还是“疏离”? / 1

第二节 多元化与价值重建 / 7

第三节 “文学穿越现实”的必要与可能 / 11

第四节 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 / 20

第二章 文学的道路 / 27

第一节 小说的繁荣与衰落 / 31

第二节 诗歌:老树新芽? 第三条道路? / 77

第三章 文史互动 / 130

第一节 学术分科与史、文独立——早期文学史书写的学术背景考论 / 130

第二节 历史理论视野下的文学史分期观念考察 / 142

第三节 作为侦探的文史学者 / 150

第四节 历史是什么——兼论波普尔的历史哲学 / 154

第四章 文化研究:机遇还是挑战? / 163

第一节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化倾向 / 163

第二节 民主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地位刍议 / 175

第三节 文化研究之弊病面面观 / 182

第四节 文化研究的立场:公式、合唱、潮流与发言 / 187

第五章 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与社会科学治国 / 197

第一节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批判知识分子刍议 / 197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姿态：“告诉”与“教育” / 208

第三节 权宜之计——一种后自由主义哲学？ / 211

第四节 新闻传媒的逻辑与陷阱：论“非常态的常态化” / 216

结语 常识教育 / 243

参考文献 / 246

附录 “礼治”、“人情”与“国民性” / 251

后记 那些荒芜的青春 / 258

第一章

文学的困境、出路与前景

当下的文学状况是繁荣还是面临困境,其出路和前景如何,对于这样的问题,论者见仁见智。笔者无意一一评述,却更关注如下一些问题,譬如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文学是应该“介入”还是“疏离”社会?如何处理多元化与价值重建的关系?“文学穿越现实”的必要与可能,以及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节 “介入”还是“疏离”?

文学是应该“介入”还是“疏离”社会,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涉及文学的功能、地位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样一些聚讼纷纭、欲说还休的经典命题,也反映了纯文学和社会主流文学、通俗文学的紧张关系。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解决方案、主张势必会影响到新世纪的文学发展面貌。

对当前文学地图的结构划分,较能为人所接受而达成共识的是“纯文学”(先锋文学)、“时文学”(社会文学或主流文学)和“俗文学”(通俗文学)(分别对应于所谓的学界精英文化、官方主导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的三分法。事实上,这是一种相当粗疏而简单的划分,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三国”式的文学上的政治地图,文学的结构分布更像是一个没有边线和界标的“多民族杂居地带”,只不过存在

着某一区域的族群比例较大的情况而已。甚至族群之间还有同化和融合的情况。以往,虽然对纯文学的理解各有倚重,但综其主张,大体不外乎三个方面:对政治的自觉疏离、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本体自觉意识、着重对重大而严肃的宏大主题的思考。前者是作为一种历史反拨和理论纠偏而提出来的,主要针对“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机械图解政治思想、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单纯传声筒的创作倾向而言;为艺术而艺术则强调文学的独立本体位置,反对忽视文学的艺术性、背离审美规律的文学创作;后者则涉及对文学功能的认识,矛头直指所谓的通俗文学、游戏文学的庸俗创作倾向。

从以上分析可知,以往对纯文学的理解,基本上是以排斥另外两种文学形态为潜隐前提的,这就使纯文学与社会文学、通俗文学经常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彼此都有突破自己势力范围的野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论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原因。然而,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之间,谁也无法取代另一方而独霸文坛,三分天下的文学格局始终难以打破,相反,倒是彼此渗透、由俗变雅或由雅变俗的态势常常出现。这与其说是由文学的三大功能——审美、认识(包括思想教育功能)、娱乐——所决定,毋宁说是在文学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文学概念的长期演变之后的对文学概念和功能的一种理解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就中国而言,历来便有文、质和载道、言志之辩,尤其是中国历来多以儒学立国,强调群体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因而对于戏剧、小说等无关乎“治国平天下”、非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小道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这种文学观念和态度通过历史文化的积淀作用而根深蒂固,以致人们一直压抑个性和欲望,贬斥文学的娱乐和消闲功能而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明清以来,戏曲、小说的地位有所提升,因为人们发现,戏曲、小说也可以负载政治思想宣传、伦理教化等社会功能(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所以倡言小说,原因便在于此)。但对“小道”的这种歧视仍未褪尽,只不过从排斥文章体裁形式的斗争转向对文学内容和功能上的一较短长(如近现代文学历史中的对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和海派的开火,某种程度上便基于这种文学观念)。尽管通俗文学作为文学的一脉一直不绝如缕,但却

依旧在为自己的合法化地位而挣扎。即使在新时期,那种贬损通俗文学的传统观念意识仍在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在新时期,通俗文学只能采取隐蔽的策略性手法,以在文学主题、思想内涵等方面部分迎合所谓的纯文学和主流文学,小心翼翼地为自己赢得一点生存的空间。这类文学往往只是因为“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意义”才被接受和认可。

反观 20 世纪 90 年代,则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大行其道,大有一朝扬眉吐气、“翻身解放”的势头。纯文学面临生存危机,纯文学刊物要么举步维艰,要么纷纷改版,大量登载通俗文学作品,历来作为纯文学中的贵族的诗歌一蹶不振。人们更侧重于个体性的当下体验,审美趣味倾向于平民化、大众化、个人化和身体化,反感和拒斥故作高深或标榜深沉的惺惺作态的宏大主题。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位置被颠倒过来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似有被边缘化和沦落的危险,于是不少原属严肃文学行列的作家也纷纷改弦更张,写起通俗性文学来了;另外一些作家或坚守,或为此而耿耿于怀、心理失衡,甚而至于以传统思维模式看问题,在旧有思维方式的驱使下,打着严肃文学、纯文学或主流文学的大旗,抡起讨伐的大棒,要捍卫和教训。然而,他们忘了,新时期的文学便是在反抗此前模式化的、政治思想主导文学创作的文学观念和现象而成长起来的。如今,作为新时期以来逐渐确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化秩序规范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重演新一轮的“封锁与突围”的历史戏剧了。

历史往往会在不同的层面出现反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基本上服务于社会政治,虽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工农业生产建设以及革命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但总的说来,公式化、模式化严重,用艺术图解政治思想的创作倾向比较普遍。这时的文学也是一种“介入”文学,但这种“介入”,更多的是被动介入,是迎合和帮腔,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个体声音被纳入到众声合唱之中,从而湮灭了创作个性和独特思考。新时期反对机械而无独立思考的“介入”,但仍然强调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然而这种“介入”更多的是对此前文学创作的历史性反拨,而思考的动机和起点仍停留在社会性重大主题

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崛起,文学由强调“写什么”转到“怎么写”,淡化文学的介入功能。这预示了文学将要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和过渡的桥梁,它为文学的转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90年代末,创作潮流日益多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女性作家和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他们注重个体化的生存感受和体验,自觉地回避、疏离宏大叙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介入性”隐而不彰。似乎历史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它的起点,针对以上情况,批评界重新呼唤文学的“介入”。但今天批评家们所呼吁的“介入”显然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帮腔和附和,今天的“介入”在精神资源上更接近于新时期文学的“介入”,即一种关注社会现实和主动批判的精神,要求突出写作主体对社会现实的独特思考和真实感受,强调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及人文关怀意识。

把“介入”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提出来,意在抗拒平庸,反对当代文坛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缺失以及道德失范、价值虚无等倾向。提出“介入”,也是对某种“疏离”的反拨,这就引发了“介入”和“疏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诚然,提出“介入”自有其道理和意义,但必须警惕不能变成对所有作家的硬性要求,否则便可能走入另一个极端而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了。社会关怀意识较强,入世精神较浓的作者,自然可去写作这类题材,而且,从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等文学外部关系的角度着眼,也少不了这类作家的创作。但志趣不在于此的作家亦不应勉强,这是作家的兴趣和自由,也是由作家较稳定的艺术兴奋点所决定。即使勉强而为之,写出的作品也一定是生硬、干巴巴而没有艺术激情和感染力的平庸之作,因为这种写作本身便是违反艺术规律的。

事实上,“介入”和“疏离”的矛盾内在于文学本体之中。文学创作是一种通过作家的中介而反映社会现实的创造性生产活动,“介入”和“疏离”都是它的题中之义。这种“反映”与“中介”、“介入”和“疏离”的内在矛盾正是文学的张力和独特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切文学创作都是一种“介入”,同时又是一种“疏离”。所谓“介入”,是指它必然要触及社会生活,关键在于其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个人主张不同而已。所谓“疏离”,则一方面指文学与社会生活并非直接等同,而是经过

作家主体的中介而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特指文学作用于社会的独特方式。毋庸置疑,文学作品显然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思考,但文学本身却不直接导向行动,或者说,不以导向直接行动为目的,其首要动机不在于社会效果,而在于文学本身。作为艺术审美活动,我们和作家一样,不能对文学本身作太多功利性的考虑,让文学负载过多。但令人奇怪的是,一方面人们要求文学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又同时要文学背负太多文学之外的东西,在文学的审美口袋里大肆夹塞私货,让文学这架马车拖着笨重臃肿的身躯,步履蹒跚。并以另一种眼光和标准来看待文学的社会效用,作机械的因果分析,从而对文学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和优劣定性,权长衡短,扬此抑彼,在缺乏相应的感受体验而导致经验隔膜和想象盲点的情况之下,以一种机械、狭隘的尺度去契短较长,动辄以“诲淫”(性描写)、“诲盗”(暴力)、有伤风化、道德沦丧、疏离时代和主流等看似理直气壮的理由劈头盖脸抡将下来,试图封杀、棒杀、一网打尽。这其实仍是一种缺乏艺术宽容和开阔胸襟的表现,同时也是旧有看待文学艺术功用地位的眼光在作祟。这些人看待文学总是习惯性地首先关注其社会功能,把社会功能看成是文学首要甚至是唯一的作用,这其实是仍把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道德教化的附庸和工具,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

文学作用于社会的独特方式在于,它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进而间接地影响社会现实。文学本身是天马行空、无所羁绊、无所顾忌的,对文学不宜作简单庸俗、武断粗暴的道德解剖。况且道德观念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封建时代的道德规范显然不可同基于个性自由、人格平等观念基础上的当代道德意识同日而语,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恐怕是古人匪夷所思的。电影摄影技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小小案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以前人们不能接受电影对人物脸部或眼睛的大特写,理由是不尊重个人尊严等,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有谁对此一惊一乍、口吐怨言呢?这也说明了道德观念的与时俱进,不可因袭、固守一隅,因缺乏前瞻性历史眼光和发展的意识而遽下判断。

至于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精神空虚、思想素质低下、缺乏理想等现

实问题,不能说和文学没有一点干系,但显然不能在两者间直接画等号,把责任全盘归咎于文学和作家,从而陷入文学决定论;也不应把文学作为扭转社会不良风气的唯一手段和工具,让其承担改造社会的功能。“以笔为旗”是一种看待文学的态度,但显然不应期望太高。文学已经负载太多,文学也需要“减负”,需要“正名”(本文当然无意于为文学这个语义缠绕的概念再下一个定义,这样的“正名”只能导致对多元化文学趣味的背道而驰和否定。不过,对文学功能的重新认识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却很必要)。在我看来,应实行文学与政治、思想、法律等其他上层建筑的双轨制,明确各自的分工和职责范围,各司其职(注意:这丝毫不意味着文学不能反映政治或文学家不能就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和见解)。这样一来,很多所谓的文学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可交由法律解决。其实,所谓的不良影响与其说是文学的直接后果,毋宁说是法制不健全、社会教育水平不发达以及相应的人民素质不高的必然反映。所以,迫在眉睫的并不是对文学的“横眉怒目”式的挑剔和批判。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的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很多涉及文学外部关系的矛盾和问题都可由法律解决,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事件,由版权问题、文学写作的侵犯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引发的法律纠纷等。国家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印刷、著作权等涉及文化、文学外部环境的法律规章制度。

当然,法律与文化、文学事业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用法律解决文化文学问题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问题还需文化、文学界和法律界的专家共同探讨和努力,这里只是提出一种思路。但即便如此,把文学和文学的外部关系区分开来仍是必要和可行的。因此,人们也不必以所谓的不良影响来苛求文学始终保持一种一本正经、中规中矩的面目。其实,某些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退一步讲,如果说当前确有某些作家以性、暴力及猎奇逐新等方式来招徕读者的情况,那么当全民素质提高之后,当这些粗俗题材已司空见惯而引不起读者的好奇甚至让读者厌腻之后,这些庸俗的东西还会有市场吗?那时,文学将会描写什么呢?生活才是文学的永恒关注和描写对象,一切“介入”和“疏离”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第二节 多元化与价值重建

严格地讲,多元化与价值重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命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命题,但思想和文学本就似连体婴儿一般血肉相连,何况思想的变迁沿革对文学影响巨大。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鲜明特征是政治思想主导文学界、思想界,新时期是另一轮思想启蒙和反思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文学本体自觉和解放以及大量吸取、借鉴西方艺术技巧和思想营养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则是个体欲望的张扬和解放以及思想多元化的年代。其中,新时期同五六十年代比同90年代以来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两者关注的都是时代主题等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也有相似之处,即都是着眼于政治及时代命题,只不过新时期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主导。

就思想话语的制造者和承担者来看,五六十年代思想话语完全由政府主导,新时期在政治环境改换的前提下则更多地由文学界负担起,如《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便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声而被载入文学史册中的。90年代的思想者群体不断扩大,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真正的思想界,思想的话语权力便转向了批评家和思想界(所谓的文学批评界也有日益思想界化的趋势)。然而,90年代的思想界显得不像以往的思想话语那样的整齐和单纯。90年代的思想是众声喧哗。西方思想话语纷至沓来,现象学、存在主义、“西马”、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各种思想主张和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各领风骚,谁也不能独霸天下。人们在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思想话语时,似有“乱花渐欲迷人眼”而手足无措、四顾茫然之感,从而导致所谓的价值虚无主义浮出历史地表。

判断一个时期是否成熟,是否具备一个时代的独立意义,关键在于这个时期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而稳定的思想文化氛围,是否具有某种

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和价值观念。90年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和颇颇互竞的年代,一切都还处于复杂的变动和生成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而不能成为一个具独立历史意义的时代。但这种不成熟也正说明了它的活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种世界的令人不安和令人困惑的状态以及主张、阐释的多样性正是力量的表现。

文学的发展状况也说明了这是一个文学的过渡时期。单从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创作的归类命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新写实、新历史、新状态、新体验、时尚写作、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60年代生”、“70年代生”、“新生代”、“新人类”、“断裂派作家”……随手拈来,便是一长串名词。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文学命名,除了多元化创作之外,却再也难以用一个更具涵盖意义的词来概括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相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的过渡性质倒是彰显无遗。大体说来,90年代以前文学的成就和偏颇同样明显,新时期对社会性主题的反思和寻根确有意义,但存在着倚重时代社会重大主题而忽视“小写的人”、忽略纯粹个人化体验感受的缺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文体、语言实验、艺术技巧、叙事方式的探索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但某些作品内容空洞、晦涩难解以及过分热衷于玩弄语言游戏和叙事魔方的缺陷同样突出。90年代末一些作家,尤其是异军突起的女性作家和包括卫慧、棉棉在内的“70年代生”的写作者们对新的题材的开掘、新的个人感受体验的描摹和写作方式的大胆尝试与探索等极有特色,但在艺术上还需进一步磨砺精炼。

显然,我们不能对一部文学作品求全责备,要求其面面俱到,而是应看它提供了哪些新鲜独创的艺术经验和感知方式。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声称文学止步不前、艺术退化、鲜有高质量的作品等,从而对文学的前途持悲观态度。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莎士比亚没有马洛不可能写作……是那些被遗忘的古代诗人铺平了道路,驯服了天生桀骜不驯的原始语言。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孤立地产生的;它们是人们多年共同思索的产物,是群体思维的产物,因此在个人声音的背后,是群体的经验。如果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它的文学史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我们

可以断言,在经过新时期社会性主题的多方艺术实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艺术探索、90年代末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之后,21世纪的文学必将在前代艺术营养哺育的基础上步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收获的季节,产生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这里也应当避免犯急躁冒进的老毛病。第一,这个过渡阶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要在各种艺术实践都能得到充分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失去耐心,拔苗助长,在艺术探索的起步阶段就对写作者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欲速则不达,以致反而损害文学的正常健康发展。第二,要有艺术上的包容心。艺术探索的初期难免会出现一些伴生问题,这时的批评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具备同情之了解,着眼于文学本身看问题。一旦戴着有色眼镜以旧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遽下判断,甚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不符合自己审美艺术标准的一概抹杀,横加贬斥,文学便难有进展和提高。出手便不凡和尽善尽美的毕竟很少,一棵艺术的嫩芽需要细心呵护才有可能开出蓓蕾小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狂风肆虐,横加蹂躏,艺术的种子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而只能是中途枯萎、凋零和夭折,那么,人类也就无所谓文学大家了。更多的是在断喝之下胆战心惊,谨小慎微,丧失了艺术探索的勇气,浅尝辄止,在本可开掘出一条独特艺术之路的入口止步,迎合主流艺术观念,变成“颠狂柳絮随风舞”,那么,艺术便永无创作个性和创新可言了。

太多的人为因素对艺术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只有在某种艺术形态得到充分发展,臻于其成熟形态,我们才能看清它的意义和优劣短长。前面已经说过,“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包括同年龄段的批评家同“70年代生”作家本来就存在着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上的差异和隔膜,这时,如何看待“新生代”的写作就必须更加谨慎小心,而不能流于粗暴武断的“打棍子”、“戴帽子”等陈旧做法了。

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归纳到一点,那就是多元化和一元化的关系问题。90年代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最大特征是多元化。90年代是多元共存、多极发展的年代,人们再也难以简单地区分出主流和边缘的界限。有人认为90年代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和道德失范的危机,因

而提出价值重建的问题。毋庸讳言,90年代确实存在着上述倾向,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批评确有必要。但这里必须警惕滑入另一种偏颇之中。重提价值重建是有针对性的,最忌讳的便是事先意味着一个预设、一个前提,心目中已经潜在地设定了一个“他者”和“批判对象”,已经作了不明确却大体粗疏可辨的区分和判断,这就很可能把价值重建变成不是讨论而是在探讨的表象之下的“声讨”和“讨伐”,变成对另一种新的但却不符合自己既定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人生选择、价值设定、思想意识的“十字军征伐”,那么这就仍然是一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思维和艺术专制心态。思想和艺术层面的问题讨论最应力避的便是这一点,缺少一种设身处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很多探讨便变成了自说自话、固执己见和一言堂家长制作风。

在思想和艺术层面应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要能包容不同流派的艺术实践和思想主张,平等对话和交流,真诚探讨和批评,这体现了思想艺术层面的民主作风,也能体现出人格的成熟程度和视野的开阔、心态的开放程度。人的胸怀越宽广,人格力量越强大,就越能包容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事物和主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思想境界还须不断提升,尤其是要抛弃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避免简单地颂扬多样性或多元性以及武断地坚持批判性的立场,而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行之有效的辩证“结婚”。重提价值重建无可厚非,但在时机的掌握、操作的方式等方面还需慎重。严格地讲,只有在社会发展成熟了,新的价值诉求和规范才可顺应潮流而自然形成,外力只能起到某种有限的促进作用。火候未到,任何外部的一厢情愿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甚至有强制启蒙的危险,在这方面,人文精神的讨论的无疾而终是启人深思的。

还有不少人把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股脑儿地归咎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身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对整体性思维的反对、对宏观政治和大叙事的攻击、对普遍主义包括普遍人性的观念的反对”等导致了如今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精神理想缺失。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有待厘清的思想缠绕体,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更难以用三言两语便能说

清。但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迎合中国部分思想者的口味而风行一时，自有其原因，说它取消历史、逃避现实也罢，说它是对新时期思想界、文学界太过注重于宏大叙事、宏观政治而忽略小写的人及其个体化感受的现象的颠覆和解构也罢，在我看来，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和消极遁逃之途，不如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选择的机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如普遍人性等普遍主义大叙事的观念是历史已经提供了的践踏他者之他性的最粗暴的方法之一。多元化便是抵御这种粗暴行动的最有效方式之一。90年代文学的多元发展现状特别是新生代作家强调个人化写作的意义便在于此。

或许，借用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的话能很好地说明90年代文学多元发展的意义以及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个民族群体已经形成形形色色的多元化趋势，这个民族开始要摆脱恶劣的群体本能意识和道德习俗了。此乃具有重大意义的悬浮状态，有人惯于诋毁它，说它是道德沦落，可是，这状态还宣布卵细胞业已成熟，打破蛋壳指日可待！

第三节 “文学穿越现实”的必要与可能

如何处理和评价文学与世俗现实的关系是文学史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现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这种研究本身便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借用吴炫教授的说法，就是要让“文学穿越现实”。吴炫教授的《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①一文，在中西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乃至思想文化史的宏阔理论背景下对文学与现实（包括政治现实、世俗现实、文学现实三个层面）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论述精辟，极富思辨魅力和启发意义。吴炫教授首先对中西思想文化史中的“穿越”、“超越”、“超脱”等范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和比较，强调“穿越”之不同于西方思想文化中的“超越”与中国道家思想中的“超脱”的独特哲学、美学蕴涵，给后面分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打下了

^① 吴炫：《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